

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再研究

◎ 傅悦 冉宏林

【摘要】 仓包包祭祀坑是目前热议的三星堆遗址八座祭祀坑之外的一座祭祀坑，发掘于1987年，对于加强三星堆祭祀区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仓包包城墙的解剖为重新认识仓包包祭祀坑提供了重要条件。仓包包祭祀坑位于仓包包城墙中部内侧，叠压于城墙北侧的文化堆积之下，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即中商时期。仓包包祭祀坑在形制、堆积、埋藏器物三方面特征均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灰坑，应为祭祀坑。

【关键词】 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铜牌饰；年代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22)6-0117-07

随着近年来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以及社会考古学的兴起，能够反映人群社会属性的祭祀遗存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重要考古发现吸引了学界内外的极大关注，6座新坑与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埋藏的祭祀用器对于认识古蜀国祭祀活动和祭祀体系十分关键，但由于各坑的年代和性质尚未明确，故目前据此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三星堆遗址除了这8座“祭祀坑”之外，还于1987年发现了仓包包祭祀坑^①。以往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研究较为匮乏，而详细了解仓包包祭祀坑的各方面信息对上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关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8-90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傅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四川成都610042；
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四川成都610042。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研究成果不多,更是缺乏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都是在开展其他研究过程中提及仓包包祭祀坑,且只是将其作为对比材料或辅助论证材料对待,因此对于仓包包祭祀坑的研究极不系统。但是,以往的零星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旧有若干成果:

其一,初步认识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来源、年代和性质等。铜牌饰是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唯一铜器,与二里头遗址等中原地区、甘青地区的铜牌饰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铜牌饰的文化因素来源和年代等。在文化因素方面,王青认为仓包包出土铜牌饰除受二里头遗址影响外,还包含土著因素^①;陈小三认为四川地区牌饰与哈密地区牌饰有密切联系^②;陈国梁认为四川地区铜牌饰可能受到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双重影响^③;朱乃诚认为仓包包出土铜牌饰由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铜牌饰演变而来^④;李学勤、杜金鹏、赵殿增、林向等均认为仓包包出土铜牌饰源自二里头遗址^⑤。尽管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有差别,但均认为仓包包祭祀坑所出3件铜牌饰,属于变体,并非主流演变形态。除此之外,对于玉石璧的摆放规律也有学者关注,并据此认为其属于毫无争议的祭祀用器^⑥。

其二,大致判断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以往学者主要通过分析坑内出土文物的年代来大致确定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其中以铜牌饰的年代分析所见最多。杜金鹏在综合考察了玉璋、陶盃等二里头文化器物在四川的出现时间的基础上认为,仓包包祭祀坑笼统定在商代较适宜^⑦;孙华则认为这3件铜牌饰出现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晚期^⑧;王青指出仓包包祭祀坑所出3件铜牌饰在年代上可能有缺环,但断在商代还是比较稳妥的^⑨。除此之外,朱乃诚通过对仓包包祭祀坑内出土器物包含文化因素的分析,认为仓包包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应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⑩;赵殿增根据仓包包祭祀坑的土坑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其年代在三星堆二期^⑪。总结起来,以往学者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早者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晚者至晚商乃至商末,但总体还是集中于商代。

其三,基本明确了仓包包祭祀坑的性质。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性质判定目前主要有作坊库房

①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② 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③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5-83页。
④ 朱乃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兼论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⑤ 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五——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1-128页;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⑥ 赵殿增:《绵阳文物考古札记》,《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⑦ 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
⑧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⑨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
⑩ 朱乃诚:《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⑪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埋藏和祭祀坑两种看法，孙华认为仓包包祭祀坑很可能是作坊库房的埋藏^①，赵殿增则推断它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瘞埋礼器祭祀的祭祀坑^②。其他诸如墓葬等性质的推测十分少见。

上述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仓包包祭祀坑十分重要，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在：首先，以往研究重点关注部分出土器物及其埋藏形态，尤其是铜牌饰和玉石璧，对于原始考古材料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很少进行专门分析。其次，缺乏对仓包包祭祀坑的系统研究，大量研究集中于部分器物，或针对部分特征作讨论。最后，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对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和性质没有形成较明确的结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仓包包祭祀坑的上述研究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原始考古资料较少、部分信息并非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等客观因素影响。可见，要再次研究仓包包祭祀坑，还得从研读原始文献开始，从中找寻关键线索加以分析。

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原始文献只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③（以下简称《简报》）。由于仓包包祭祀坑并未经过考古发掘，而是村民取土偶然发现，坑内填充堆积和文物埋藏状况均被破坏，考古信息有严重缺失，但我们仍能够从中获取以下重要信息：

1. 地理位置

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地理位置，《简报》中有如下记载：

第78页：……出土文物的地点仓包包位于古城中心月亮湾台地东北部的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的脊背状台地上……台地有高1米余，宽20~30米，长400~500米、呈东西走向的土埂。因早年在土埂上修建过粮仓，当地村民称此土埂为“仓包包”。

《简报》中提到的“脊背状台地”、“呈东西走向的土埂”，通过2012年的考古勘探以及2013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其为仓包包城墙。仓包包城墙与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东城墙合围，形成了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仓包包祭祀坑正位于仓包包城墙中部内侧（图一）。

2. 层位关系

《简报》中有以下描述：

第78页：从取土断面上观察，文化层厚达70余厘米……主要为三星堆遗址三、四期的堆积。文化层以下是青灰色生土层……这批文物是在文化层最下部发现的。

第80页：在距地表深约1米处有一土坑，土坑长约2米，宽约1米余，土坑打破生土深度40厘米左右……

据此可以大致推测，仓包包祭祀坑出土文物发现于三星堆遗址晚期文化堆积下部并打破青灰

① 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

② 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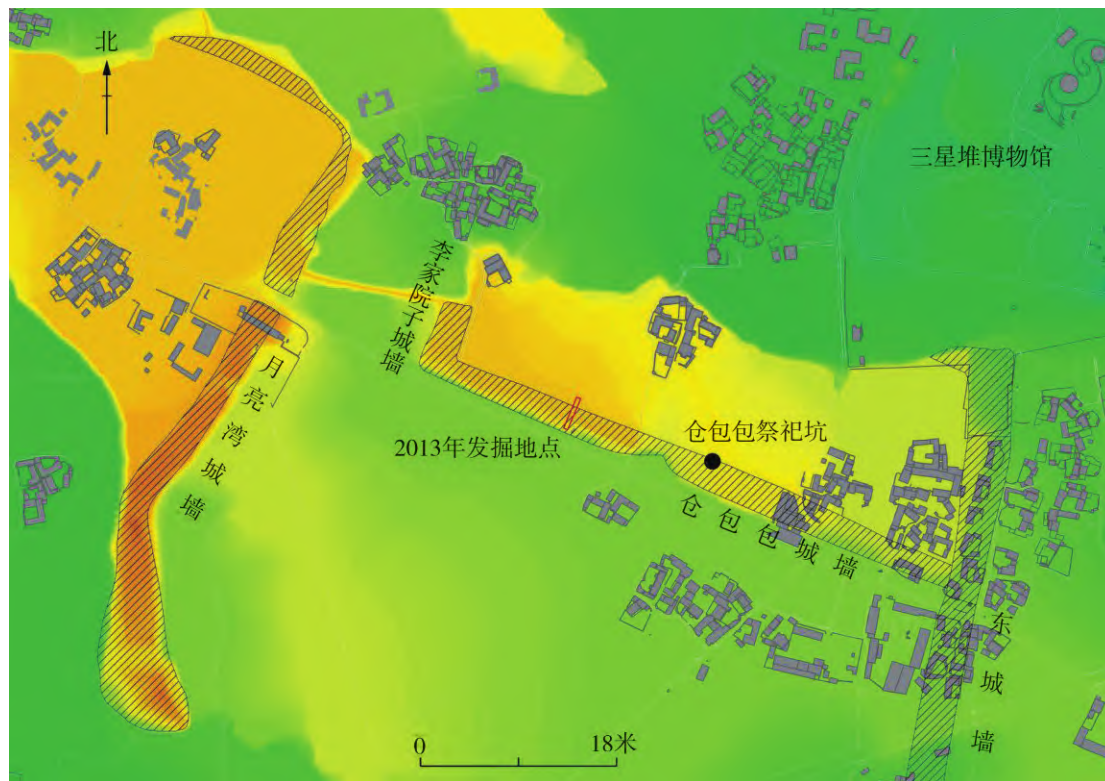


图1 仓包包祭祀坑位置示意图

色生土层的土坑中。通过2013年对仓包包城墙的解剖^①，我们确认城墙内侧即北侧有较厚的文化堆积，这与《简报》记载相符。如此一来，仓包包祭祀坑应该是叠压于城墙北侧的文化堆积之下。

仓包包城墙的夯土多为青灰色黏土，这与《简报》中提到的“青灰色生土层”较为相似，而且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勘探，我们已经明确仓包包小城所在区域的生土并非青灰色黏土，而是以深褐色或黄褐色黏土为主，因此仓包包祭祀坑打破的或许并非生土，而是城墙夯土。也就是说，仓包包祭祀坑应该是打破了仓包包城墙。

3. 埋藏情况

《简报》关于仓包包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埋藏情况介绍较为简略，包括：

第78页、第80页：……距地表约65厘米处发现玉凿……距地表约85厘米深处发现石璧、石璧芯……石璧按大小顺序依次垒叠在一起……还发现朱砂、烧骨和灰烬……出土的文物全部是被埋在土坑内的。

从《简报》的描述可知，除了玉凿之外，其余文物都位于祭祀坑偏下位置，且相对集中分布，石璧按大小有序摆置，文物附近还分布着朱砂、烧骨和灰烬等。需要注意的是，仓包包祭祀坑发

^① 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6-51页。

现的这种石壁按大小有序摆置的现象，并不是孤例，将在下文详述，这种石壁的摆置方式可能属于某种特定的祭祀礼仪。

《简报》关于仓包包祭祀坑的地理位置和层位关系，对于准确探讨其年代十分关键，以下就此作进一步分析。

上文我们已经大致分析了仓包包祭祀坑可能存在的层位关系，即被仓包包城墙内侧的文化堆积叠压，同时打破了仓包包城墙。尽管仓包包祭祀坑所在区域并未经过系统发掘，相关单位出土文物状况也并不清楚，但2013年解剖仓包包城墙时所获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参照用于判断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理由在于两点：

第一，仓包包祭祀坑与2013年解剖的仓包包城墙相距仅100米左右。如此近距离，二者所处的层位关系可能比较一致。

第二，仓包包城墙本身作为城址固定的线性遗迹，不会发生太大的位移，而城墙内侧的生产生活活动在小范围内也不会存在较大差别。这意味着，仓包包祭祀坑所在的城墙内侧的文化堆积，与2013年解剖仓包包城墙地点的城墙内侧文化堆积可以视为相同堆积，出土文物、年代范围等应比较接近。

2013年解剖仓包包城墙时发现的遗迹和地层单位较多，大致可分为三组：其一是城墙叠压的早期堆积，其二是城墙及附属堆积，其三是城墙之上叠压或打破城墙的堆积。根据上文的分析，仓包包祭祀坑开口于第三组单位之下，打破第二组单位，而第一组单位与仓包包祭祀坑没有太大关联。因此，要判断仓包包祭祀坑的准确年代，应该重点分析第二组单位以及第三组中最早一批单位出土文物。

第二组单位所出文物几乎均为陶器残片，可辨器类包括小平底罐、深腹罐、宽沿盆、高柄豆和器盖等，其中宽沿盆（图2：8）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各地点出土的同类器特征相似^①，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离仓包包城墙的始建年代太远，显然是夹杂在夯土之中的早期陶片。小平底罐为圆耸肩（图2：1、4、5、6），高柄豆盘整体较浅且微出沿（图2：2），二者与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②的H2332出土同类器的特征近同，高柄豆圈足整体呈喇叭状，腹面内凹（图2：3），深腹罐有短颈和窄沿、圆肩（图2：7），二者与郎家村地点第⑥层同类器相似。郎家村地点H2332和第⑥层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二里岗下层^③，则第二组单位的年代下限因此可定。

第三组中最早的遗迹单位可以G5和第⑨层为代表，二者出土陶器包括小平底罐、高柄豆和鸟

① 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对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的两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45-551页。

②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216页。

③ 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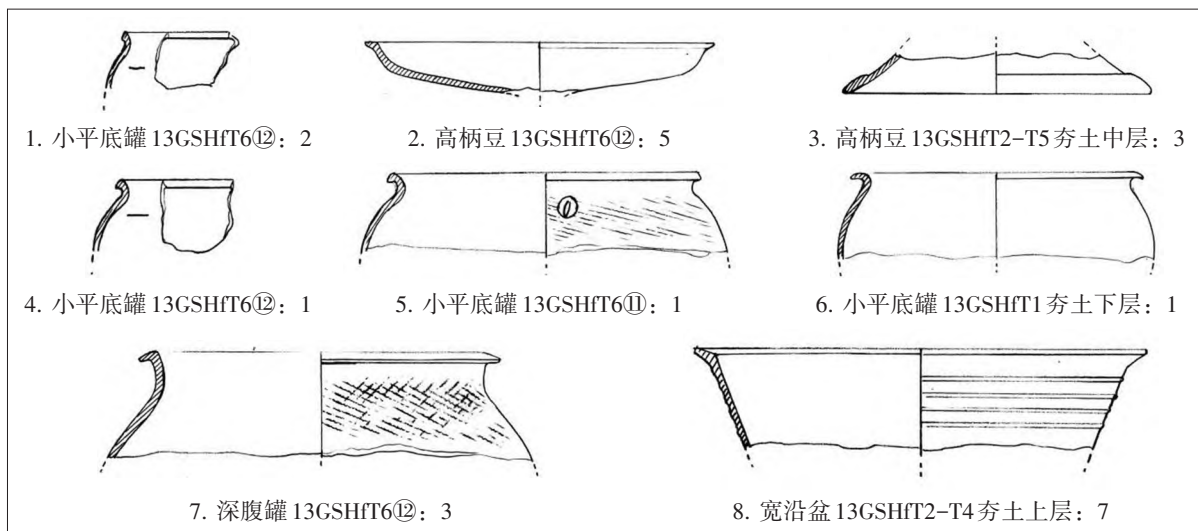


图2 仓包包城墙发掘地点第二组单位出土部分陶器

头把勺等。小平底罐的肩部进一步变耸成为耸肩(图3: 2、3),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H202^①的同类器较为相似,喙部微勾的鸟头把勺(图3: 1)、外凸部位较弱且只有一道弦纹的纺锤状高柄豆柄(图3: 4)以及腹面微凹且凹弦纹位置靠近圈足和柄部交界处的高柄豆圈足(图3: 5)在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地点86Ⅲ⑧c、⑨等单位^②中有大量发现,同出的就有类似兰苑H202的小平底罐。金沙兰苑H202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③,则第三组中最早遗迹单位的年代也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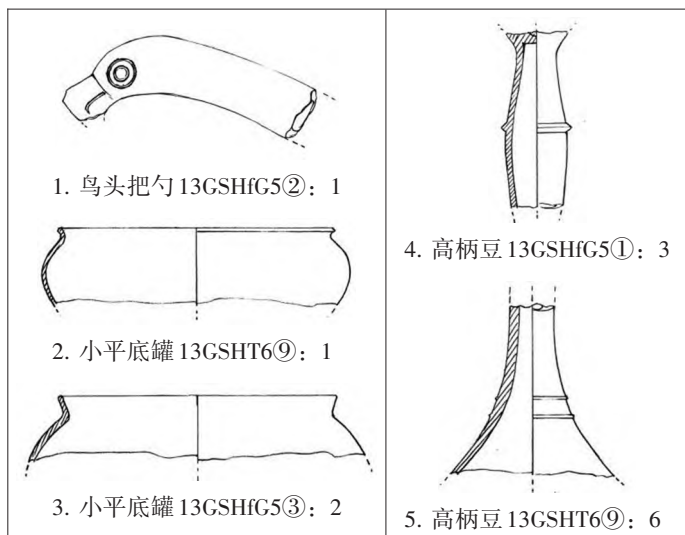


图3 仓包包城墙发掘地点第三组部分单位出土典型陶器

综上所述,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二里岗下层,不晚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考虑到仓包包祭祀坑打破了仓包包城墙,距离仓包包城墙的建造年代相对较远,而与其他同样叠压城墙的文化堆积年代靠近,故仓包包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可推定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即中商时期。

①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② 万娇:《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15-118页。

③ 冉宏林:《金沙遗址分期再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7-146页。

将仓包包祭祀坑与三星堆遗址内其它坑类遗迹作比较,可以发现仓包包祭祀坑在形制、堆积、埋藏器物三方面特征均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灰坑:仓包包祭祀坑形制规整,普通灰坑多为不规则形状;堆积底部可见朱砂,伴有骨渣和灰烬,普通灰坑堆积底部并无此类现象;坑内器物完好、均为礼仪用器且摆放遵循一定规律,普通灰坑多起到填埋生活垃圾的作用,坑内极少发现完整器物,更遑论器物等级及摆放规律。由此可以确定仓包包祭祀坑并非普通灰坑,其性质、用途仍待进一步研究。

在此尝试从墓葬、窖藏、祭祀遗存三个方面对其性质略作探讨。目前哈密地区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牌饰都出自墓葬,铜牌饰作为礼用性质的器物没有争议,但具体的使用制度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材料佐证,还不能盖棺定论铜牌饰仅出土于墓葬。在四川地区,出土铜牌饰的地点除了仓包包祭祀坑之外只有高骈器物坑^①,均出自坑类遗迹,未发现较明确的人骨。人骨在四川地区的保存情况较差,但从仁胜墓地^②观察,至少留存有骨痕。仓包包祭祀坑和高骈器物坑中均没有发现人骨及遗痕,而且仓包包祭祀坑的底部还发现有灰烬,可见其作为墓葬的可能性不大。窖藏的可能性亦较小,一是出土器物的体量和种类太少,二是对于窖藏而言,朱砂、灰烬和骨渣的存在同样不合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仓包包祭祀坑作为祭祀坑的确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与仓包包祭祀坑相似的遗存除了上文提到的高骈器物坑之外,还有1929年在燕家院子发现的玉石器坑^③、1987年在绵阳麻秧发现的器物坑^④以及2001年在金沙“梅苑”地点^⑤发现的祭祀坑。燕家院子玉石器坑、麻秧器物坑和仓包包祭祀坑三个地点都出土有从大到小摆放的石璧;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玉箍形器也见于金沙“梅苑”地点^⑥;高骈器物坑与仓包包祭祀坑均出土有铜牌饰;在仓包包祭祀坑、高骈器物坑、金沙“梅苑”地点均发现有使用朱砂的痕迹。高度重合的器类、相同的器物摆放方式、较为固定的堆积现象,表明这些遗存可能是一定时期内存在于古蜀地区的同类祭祀遗存。

受限于目前掌握考古材料的不足,对仓包包祭祀坑所反映的祭祀礼仪、器用制度等方面仍存在空白,有待后续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论证。

(责任编辑 杨丽华)

- ① 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敖天照:《广汉高骈出土商代玉器的补正》,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成都:天地出版社,2006年,第127-131页。
-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 ③ 葛维汉:《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沈允宁译、陈宗祥校,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第20-95页。原载《葛维汉民族学考古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76-198页。转引自Cavie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4(6)。
- ④ 赵紫科:《盐亭县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
-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 ⑥ 施劲松:《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2期。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Sanxingdui Burial Pits

Sun Hua & Peng Siyu

Abstract: Four of the six newly discovered burial pi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anxingdui site are relatively regular, with the same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 and burial situation as the two previously discovered pits, and most of the buried utensils in different pits can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arbon dating data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pi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his confirms that these pits are all concurrent, and the burial date is during the late Yin Hui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about 1100-1150 B. C.). The ancient dwellers of Sanxingdui collected the temple josses and furnishings that had been damaged for some reason, leveled a site along the southwest wall of the sacrificial area, and planned six burial pits with symbolic arrangement, and transported the damaged temple fosses to the edge of the site pit, and buried them sequentially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New materials prove that the ancient dwellers of Sanxingdui had a religious system with the three human-head & bird-body gods as the central deities and two large sacred trees symbolizing the sun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iverse. Nearly 100 life-size bronze and wood figure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obles of the Sanxingdui ruling class,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 made their own images may aim at attaching their spirit and soul to these statues in order to serve for the gods at any time and listen to the call of them. We can estimate that those strangely combined bronze ware fragments in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s may be the four pieces of worship bronze objects that were placed in front of the statues, and among them, the bronze statue of a bird-leg god heading a container may be a junior god who conveys the will of the senior god. The era in which the ancient dwellers began to dig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s is just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civilization of Sanxingdui was declining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Jinsha Village rose in Chengdu, it was also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decline of the Shang Dynasty was declining and Zhou-Kingdom was rising, and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s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Keywords: Sanxingdui; the Burial Pits; Bronze Statues; Bronze Wares; Offering Sacrifices to Josses or Ancestors

Restudies on Cangbaobao Sacrifice Pit of Sanxingdui-Relic

Fu Yue & Ran Honglin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eight sacrificial pits that are in hot studies at present of the Sanxingdui-Relic, the Cangbaobao Sacrifice Pit is one sacrificial pit which was excavated in 1987 and is of great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Sanxingdui sacrificial area. The dissection of the city wall of Cangbaobao provides us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re-understanding the Cangbaobao sacrificial pit. The Cangbaobao Sacrifice Pit is situated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middle of the Cangbaobao City Wall, stacked under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wall, and the age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upper level of Erligang to the first period of Yinxu-Relic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at is in the period of Shang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ngbaobao sacrificial pit in terms of the shape, the accumulation, and the buried utensil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other ordinary grey soil pits, and

should be a sacrificial pit.

Keywords: Sanxindui-Relic; the Cangbaobao Sacrificial Pit; Bronze Plaque; the Era

Studies on the Hairstyle, Clothes–Accessorie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Head–Twisting & Kneel–Sitting Bronze Image in Sanxingdui–Relic

He Xiaoge

Abstract: Many brand-new artifact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new-round excavating activities at Sanxingdui Burial Pit, among which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ree head-twisting & kneel-sitting bronze figures unearthed from Buried Pit No. 4 in terms of hairstyle, clothes-accessories and the us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By comparing the figures' hairstyles of Shijiahe, Sanxingdui, Yinxu, Shizhaishan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we can see that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represented and symbolized by the head-twisting & kneel-sitting figure-statues have no high-ranking status, nor are they indigenous persons, but may have something with the east, that i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materials of figure-statues of Sanxingdui and Yinxu indicate that the statues are not from the local or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s, and the people behind the statues may be servants, but not the lowest rank ones. Referring to the screens excavated from the tombs of the King of Zhongshan and the one of the King of Nanyue, and we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ulation from the sizes of the bronze figures and judge that they are the bases of the screen, and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creen is used to enclose and set off the idols, sacred trees,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or altars in rituals. And the conjecture that the screen is used for revolving rulers' or their families' seats is contradictiv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rtifacts in the pit were originally used for sacrificial ceremonie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arry on deep research.

Keywords: Sanxingdui Cultural Relic; Head-Twisting & Kneel-Sitting Figure Statues; Hairstyle; Clothes-Accessories; Screen

Studies on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View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hen Xu

Abstract: It is the rural area that is a high-quality carrier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rural culture lies in re-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rural areas, fully stimulating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rural areas, and enhancing rur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ecause rural cultural production is detached from rural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peasants lack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daily life practice of farmers is no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the social force and markets from outside lack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cultural resources there's also short of a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outsid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native cultural subjects.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rural cultural